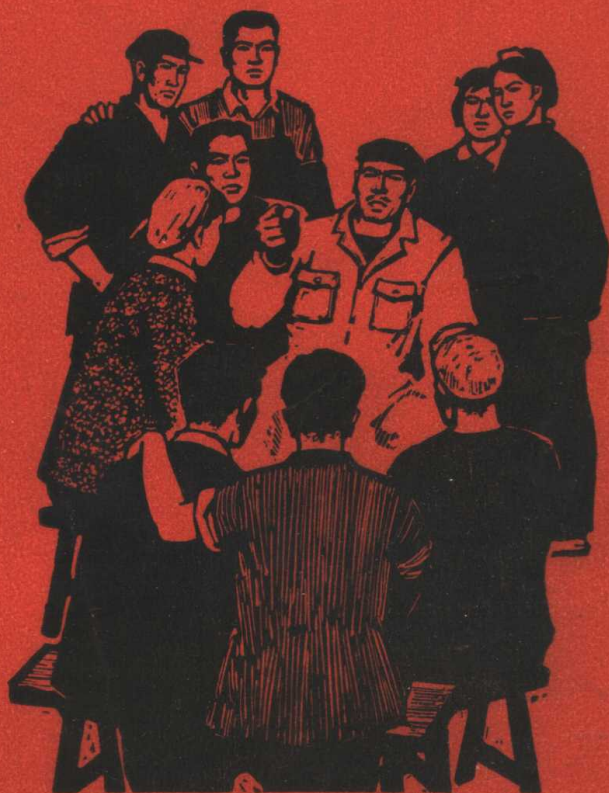




(續 集)

人間到獄地人

ONGDIYUDAORENJIAN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从地狱到人间

(續集)

本社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从地獄到人間

(續集)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 1/8 字数 77,000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7,000

统一书号 7072·297

定 价 0.28元

目 录

从童工到大学毕业生	刘蔭福(1)
一个工人的历史脚印	鲍志荣 口述(11)
拨开云雾见青天	刘玉堂 口述(18)
两个十四年	陈秀兰(29)
春暖不忘冬寒	金 禾 急 流(39)
兵	胡清和(52)
旧社会的大学毕业生	王耕畚(70)
一个演員 两重身世	常香玉 口述(75)
舞台上的悲欢	張 韜(87)
理发师的今昔	刘 奎 口述(103)
一个“堂倌”翻身的故事	庄新儒(115)

从童工到大学毕业生

刘 蔭 福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伟大节日里，工厂中、大街上，一片喜气洋洋。解放后翻了身的兄弟姐妹，更是高兴得心花怒放。“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的“亲”就是党，是毛主席，是新社会。过国庆，往事一幕一幕地涌上心来。我这个过去无依无靠的穷孩子，今天大学毕业了，这一天一地的变化，正反映了我们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巨大改变。

孤 儿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静海县，从小就跟着爹娘受尽了地主老财们的剥削和压迫。八岁那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的家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们没法生活了，就在一天夜里，全家逃到天津。我们没有住处，有时在马路上过夜，没吃的，就去讨饭。母亲身体弱，连饿带累的，到天津不久，就去世了。为了能让我们几个孩子喝碗稀粥，父亲一个人，不得不拚死拚活地干活。每天天不亮就走，很晚才回家。就在他病得连口水也咽不下的时候，还照样出

去干活。有一天，天都大亮了，父亲还没起来，二姐就去喊他，一连喊了几声，也没答应，再去摇他，才知道父亲早已断气了。我们姐妹几个扑到父亲僵硬的尸体上，哭爹喊妈。邻居也净是穷人，看到我们几个可怜的孤儿，没有一个不掉泪的。他们自己也饿着肚子，对我们也没有多少办法。以后由工人弟兄们勉强凑了几个钱，买了个破匣子，把父亲埋葬了。父亲一死，我们更没有依靠了。那时，哥哥虽然在纱厂找到活儿了，可是连自己的吃喝也顾不上，哪养得起我们姊妹！我和二姐、妹妹就拾菜帮子、拣煤茧，饥一顿、饱一顿的，瘦得皮包着骨头。

实在没有活路了，二姐十六岁就出嫁了。那年我十一岁，妹妹九岁，我们更没依靠了，就跟着大姐去住。大姐的婆家是个吝啬的小商贩，公婆对她本来就百般虐待，一看又来了吃闲饭的，他们更把大姐当成了眼中钉，整天不是骂就是打，大姐愁得整天哭。

当 童 工

我那时虽然才十一岁，因为从小生长在穷人家里，已经很懂事了。为了不让大姐多为我们操心，我就和一起拾煤茧的小伙伴商量好，到附近的公大纱厂（现棉纺二厂）去做工。说去做工，可哪有那么容易？！才十来岁，本来还是个孩子，加上长期缺吃少穿，个子长得又瘦又小，去了几次都没验上。直到这年冬天，才算凑合着验上。上班以后，那些与工头沾亲带故的人，都被分配到各车间里学技

术，像我这沒有“靠山”的孩子，便只能倒小紗、扫地，还得給工头端茶打水。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每月只給二十多斤杂豆或杂豆面。这样干了一年多，他們就把我裁下来了。

过了一陣，裕丰（現棉紡一厂）紗厂招工时，我和妹妹一起进了这家工厂。

这个厂，剝削童工的花招与公大紗厂不太一样。他們大肆宣傳，这个厂的工人每人每天管一頓飯，其实，就是中午发两个发霉的黑卷子，可是一天却要給他們干上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工人們餓着肚子干活还得受监工的欺压。我們車間里的监工都是些日本女人，她們喝了中国工人的血，个个长得腰粗体胖，吃饱了沒事时就到車間轉悠，千方百計地找碴打罵工人。

有一天，日本女工头看見一个姐妹上厕所時間长了，就多了心。等这女工一回来，狠毒的女工头抓住她的头发，就把人拉了过来，渾身上下到处乱翻，可是，她什么也沒找到。翻不出东西，这工头怎肯罢休？！就逼这个工人把鞋脫下来。可巧，工人的鞋里垫着一团乱綫头，女工头可算抓住“把柄”了，她“噢儿”地一声尖叫，举起棍子就打，刹时，女工的衣服上渗出一块块的血斑，直被打得暈倒在地。

妹妹被这情景吓得精神受了刺激，晚上回家只是傻呆呆地坐着，一句話也不說。剛睡下不久，就猛地大声喊叫起来：“三姐快跑，日本娘們儿追来了……。”大姐望着我和妹妹，流着泪說：“好妹子，姐姐不能眼看着你們被折磨

死，回来吧！要餓就一块儿餓，有口吃的就一块儿吃。”

我們在裕丰干了一个多月，就又回来了。

不久，公大六厂（現棉紡二厂）招考徒工。这时哥哥正在这个厂做工，他发愁地說：“要想取上个驗工的資格，非得給工头送礼不可！”可他賺的那点儿錢連自己吃飯还不够，拿什么送呀！后来还是姐姐想出了办法，托跟哥哥認識的工人們跟工头說說好話試試，工头勉强让我参加了驗工，居然也驗上了，可是才干了几个月，我还是被他們裁下来了。

后来裕大紗厂（現棉紡三厂）招考工匠，我又去了。但是当工匠得有一定的技术，驗工也是驗技术活儿，我虽然在紗厂做过工了，可是并沒学到一点儿技术，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驗工那天，应招的人按照規定要干上一天“捻头”和“穿筘”的活儿，下班时由工头“驗”，他說要誰，就算驗上了。驗工开始以后，車間的工人們乘工头不在我眼前的时候，就赶紧教我干一会儿，工头过来，我自己再接着干，一直到下午下班，工头开始驗工了。驗到我这里的时候，教我干活儿的工人們就凑过来，装作評論我的活儿，故意說給工头听：“別看她人长得单薄，倒是个能干活儿的孩子！”工头歪楞着脑袋看了半天也沒挑出多少毛病来，这次，我就算驗上了。

在三大敌人統治下的旧社会，工人階級到处受压迫、受剝削。在短短的几年里，我去过公大、裕丰，如今又来到裕大，厂子虽然换了，厂里的資本家和工头却是同样毒

狠，工人的生活也同样是悲惨的。工人们从早到晚空着肚子干十二个小时不算，工头们还变着法儿的对工人进行人身迫害。

有一天，和我同一个车间的工人老刘饿得实在不行了，工头一走，他就把浆纱剩下的浆子拿来，顾不得里面含有化学药品，用勺子舀了就吃，不料被工头看见了。工头打了老刘还不算，又把浆子桶挂在老刘的脖子上，让他站了一夜。

工头们对女工和她们孩子更是残忍。那时候，有孩子的女工不准把孩子带到工厂，更谈不上给孩子妈妈喂奶的时间了。为了使孩子不至于被活活地饿死，有的女工就偷偷地将孩子带进工厂或车间，安置在工头看不到的地方。厂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残忍的事情：一个女工将孩子藏在车间的棉花筐里，工头来车间时，这女工怕孩子被发现，就用棉花把孩子盖上了。哪知，这个工头早就看见了，他故意调这女工干别的活儿离开这里，又从别处调来一个工人顶替。刚来的这个工人因不知道筐里还有一个孩子在熟睡着，把筐里的棉花往机器里一倒，雪白的棉花顿时染成鲜红，小生命就这样被工头残害了。

工人们对于工头恨之入骨，除了参加有组织的罢工斗争之外，个别工人也自发地跟他们斗争，工头来车间，工人就干一会儿，他一走，就给他“磨洋工”。有一次，工头不在车间时，我就拿了块布头儿补袜子，刚缝了几针，这狡猾的家伙又转了回来，我赶紧连针带线地把脚伸进鞋里，可

还是被工头看见了。工头来到我眼前，上下打量了我半天，然后装作没事似地说：“刘蔭福，上那边‘落軸’去！”他幸灾乐祸地想看着我如何站起来，脚下的针又如何扎进脚掌。和我一起干活儿的姐妹们马上就看穿了工头的恶毒企图，抢先替我把那活儿担了下来。这个工头只好没趣儿地走开了。

由于工人们恨透了资本家和工头，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们曾经举行过几次罢工斗争，在斗争中，工人不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资本家和工头的真实面目，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斗争的决心和信心越来越强了。

解 放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了。从此，我们工人再也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而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工人阶级再也不是被人看不起的“臭”工人，而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了！

解放后，我们真是如鱼得水，没有人敢欺侮我们，干活用不着再提心吊胆。下了班，我们还听政治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上业余学校，学习文化。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并且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懂得了劳动的伟大意义，我改进了穿筘操作，使一个人能干两个半人的活，还提高了质量。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我被评为天津市的特等

劳动模范。

一九五一年四月間，党让我出国訪問。当我坐上火車到首都的时候，簡直像做梦一样：过去拣煤窑的穷孩子，今天怎么会出国。特别是当見到我們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的时候，我激动得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同刘少奇同志握了手，本来厂里的兄弟姐妹让我替他們向毛主席問好，我也給忘了。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翻来复去地想，想新旧社会的不同，想我們工人阶级一定得爭气，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搞好。

我随我国政府代表团，去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参观訪問，还见到了斯大林同志。

回国后，我当了棉紡三厂基层工会的副主席，以后又被选为四区的副区长。我一下担当这么多的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依靠党，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当时，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沒有文化。解放前我一天学也沒有上过，一个字也不識，連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虽然解放后参加了識字班，认了几个字，但是，还讀不懂毛主席著作。計劃、总结也写不了，听报告记录不下来。沒有文化哪行呀！工人阶级要当家作主，就要学习做好工作的一切本领。我沒文化，就下定了决心学习文化。

学 文 化

当时工作忙、事情多，常常开会，学习的时间很少。

怎么办呢？我就每天早晨五点钟进厂，在河边的小楼上自己学习。每天晚上人家都睡了，我再一边念，一边写。书和小本子随身带着，不认的字就问，不会讲的就拜人为师。

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虽然满腔热情，不怕劳苦，仍不能很好地完成党和群众交给自己的任务。党为了培养我，在一九五四年让我上了工农速成中学。临走时，党委书记还一再鼓励我，要我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祖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刚入速成中学的时候，考试成绩很不好，语文不及格，数学才得九分。实际上我要从加减乘除学起。要在四年的时间里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困难很多。特别是一开始上课，老师讲的我听不懂，笔记记不全，书上有很多字不认识。可是当我一想到，在旧社会，反动的统治阶级不仅掠夺工农的血汗，连工农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如今，新中国的教育已经变成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服务的了，党和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当起自己的任务时，我就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懂的就问，决不马虎，经常请求老师和同学帮助，学校也特别照顾我们，每天晚上都有老师辅导。经过了四年的艰苦学习，战胜了很多困难，终于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了。

上大学

中学毕业以后，党又让我进了天津大学纺织工程系

(后来天津大学紡織工程系并入河北紡織工学院)学习。党对我一次再一会的培养，給我极大的鼓舞，更使我体会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就决心把功課学好，由于底子薄，学习上遇到的困难更多一些，我就不惜多花上一倍或几倍的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地加强复习。領导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常常强迫我睡觉。有时他們把自修室的門鎖上，我就慢慢地蹑出宿舍，到厕所去学习；有时他們把我的书藏起来，我就倒在床上琢磨。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星期天很少休息。但有时一出去开会，就是好些天。为了不使功課拉下，我就帶着书去。散会后的业余时间，我哪儿也不去，就把房門倒鎖着溫課。开完会回来还要补課，老师和同学們也都主动、热心地帮助我。

在学习的过程中，虽然困难很多，但我想到这是党交給的任务，是受工人階級的委托，就一定要为工人階級爭口气，把学习搞好。特別是讀了毛主席的著作，看到“学而不倦”的話，更給了我克服困難的精神力量。

在党的关怀下，在老师們的耐心教导和同学們的热心帮助下，經過和无数困难作斗争，我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大学毕业了。

解放十五年中的多半时间，我在讀書。党用这么大的力量培养我，正是要我們工人階級更好地当家作主，要我們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棉紡三厂，新的工作，对我來說，又是一种新的考驗。今后，我

一定在党的领导下，更多地向工人同志学习，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运动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个工人的历史脚印

鮑志荣 口述

有人問我：“你在旧社会是怎样当上工人的？”提起这个问题，便勾起了我許多辛酸的往事。

走投无路 被迫离乡

四十三年前，我出生在江苏泰州县一个貧农家庭里。当时，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完全靠着我家八亩地的收成。那年月，土地，它是我們穷苦农民的命根子啊！

听爸爸说，我家的八亩地是爷爷用血和汗换来的。他老人家为了攢錢置地，成年累月手不拾閑。从开春到秋后，在地主家当短工；冬天，还要跑到上海、苏州一带找活干。老人家好不容易到晚年才积攢下一笔錢买下几亩地。爷爷想：自己有了地种，可再不受地主的气啦！誰知地主听到爷爷要买地的消息，便暗暗設下了夺地的圈套。他派狗腿子假装好人来找爷爷，非要当买地的介紹人，还说买地的錢不够，可以借給爷爷几十块錢。那时候找地主借債，就好比一脚踩进稀泥塘，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真沒料到，那年老天爷也成心和穷人找麻煩。全家辛

一年，眼看临到秋收时，一连下了二十天大雨，八亩庄家毁的只收下一千来斤稻谷，除去种子，剩下的只勉强够三口人的口粮。全家六口人哪能混过一年？吃什么？用什么？再要还债又怎么能活下去呢？爷爷愁得郁闷在心，加上劳累过度，一病不起。

正在我家遭到天灾人祸的时候，狠心的地主便又施展了他那阴险毒辣的手段。一天，地主指使狗腿子来我家，一进门就假仁假义地问：“鲍爷，病好些了吗？生活有难处尽管说话。”爸爸知道地主心怀歹意，可是，眼看着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爷爷，没钱治病，走投无路，不找地主借债，又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又借下一笔冤枉债。钱借到手，爷爷的病也越来越沉重，终于去世了。爷爷一死，连口棺材也买不起。这时，有空就钻的地主又假装好人，指使狗腿子来到我家探听消息，还满口答应再借给我们几十块钱，为爷爷办丧事。爸爸是个老实人，经不住狗腿子的油腔滑调，结果，旧债未还，又加上了新债，地主的圈套也越勒越紧。

爷爷死后，我家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这一年，连下地的种子都没有了。实在没办法，爸爸给地主当了雇工。爸爸尽管拚死拚活地干，也养不了家。妈妈和哥哥只好整天在野地挖野菜来充饥。一天三餐吃野菜，一家大小脸全肿的老高。爸爸哪忍心看着孩子们挨饿受罪呢？他到地主家想借点粮食，救一家人的性命。好话说了千千万，地主才板着脸，冷冰冰地说：“好吧！借你八斗，可是秋后得

还我一石！”八斗粮只够吃一个多月，转眼又要断粮了。这时，有人劝爸爸说：“还是到城里找找活路吧！”三說两說爸爸的心被說动了，下决心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要走連吃的都沒有，又哪有路費呢？爸爸沒有办法，只好又去找地主借債。这一次，再也不像以往借債那么“痛快”了。爸爸一进門，地主便拿出帳本，翻动着白眼珠，撥弄着算盘子，凶恶地大声吼叫起来：“姓鮑的，你前前后后欠下我一百五十块钱，加上利息三十块钱，怎么，还不还，你还想抵賴嗎？”这时，事前受地主嘱咐的狗腿子在一旁答話了：“沒錢拿地来！用地抵債。”爸爸的心一惊，这简直是硬逼着穷人把命根子交出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时候，脚踏人家地，头頂人家天，哪有穷人說話的地方呢！就这样，爷爷用血汗换来的八亩地被地主霸占了。我家一破产，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了，爸爸忍着心痛卖掉最后仅有的一間土房，买了船票，到上海另找活路。

跳出火坑 又进牢籠

我們全家抱着一綫希望，来到上海。天下烏鴉一般黑。在恶狼当道的年头里，我們逃出了火坑，却又进了牢籠。

爸爸好不容易托人介紹，才把我送到馮强泰机器厂学徒。資本家不拿工人当人看，每天用藤条抽打工人。那年我只有十五岁，每天四点钟起来給老板家里生火、燒洗臉水、倒馬桶、准备早飯。这些杂活剛干完，不等喘口气，